

福建畬族的族称、源流和迁徙

蒋炳钊

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五省六十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福建畬族有十九万七千多人（1978年数字），占全国畬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分布在全省四十多个县、市，其中居住在宁德地区十一个县的山区就有十六万一千多人。他们长期与汉族杂居，形成了“大散小聚”的居住特点，是一个散居的少数民族。

一、关于畬族的族称

畬族是福建一个古老民族。唐宋时代聚居在今漳汀地区。唐刘禹锡曾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①《云霄厅志》称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蛮僚啸乱”。^②《资治通鉴》云：“（昭宗乾宁元年）是岁，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黄连洞在汀州宁化县南）”。^③“洞砦”“蛮僚”“洞蛮”都是指活动在福建境内古代的少数民族，应是畬族最早的名称。

公元十三世纪中期的南宋末年，史书上才开始出现“畬民”和“峯民”的专称。刘克庄（1187—1269年）《漳州谕畬》一文说：“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蛋，在漳曰畬。西畬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畬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④最早提出了“畬民”的名称，并指出漳州同西边的潮、梅，北边的汀、赣，即闽粤赣交界这一地区都是畬民居住区。文天祥（1236—1283年）《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亦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峯民群聚……”。^⑤上述史书所记载的“畬民”与“峯民”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民族，前者指居住在福建漳州一带的畬族，后者称广东潮州的畬族。由此可见，畬族名称的出现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了。

“畬”最早作“畬”，读音有二种，或读yú（余），或读shē（奢）。读音不同，其含意也稍有区别。音读yú的，据《说文解字》解释是，“畬，三岁治田也。”“从田，余声（以诸切）。”读作shē音的“畬”字，后来也写作“畬”，意为刀耕火种。《集韵》：“畬，火种也，诗车切”。尽管“畬”字读音和解释不很一样，但从字义来说，都有开垦荒地、刀耕火种的意思。所以刘克庄根据他们当时“皆刀耕火种，崖栖谷汲”，而命名为“畬民”。这就是畬族族称来源的因由。

“峯”字音shē，与“畬”字读shē音同。“峯”字是广东汉人的俗字，据胡曦《兴宁图志

考·耑人条》云：“耑，本粤中俗字，或又书作畚字，土音并读斜”。《广东通志》曰：“畚与耑同，或作耑”。可见不论称“畚民”或“耑民”都是指同一个民族，即今之畚族。“耑”与“畚”读音虽同，但含义则完全不一样。顾炎武说：“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复居息为‘耑’”。⑤李调元《田斋琐录》亦载：“耑音斜，近山之地曰耑”。檀萃《说蛮》云：“耑，巢居也”。这些记载都说明以“耑”作为民族名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是指在山间搭棚居住的人。

由此可见，“畚民”和“耑民”二词同时出现在十三世纪，只是由于汉族文人对闽粤两地畚族经济生活观察的着眼点不同，才出现上述的异称。他们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不是如有人所说那样，是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但是，“畚”字来历甚古，早在春秋时候就已出现，《易·无妄》有“不耕获不菑畚”句。而“耑”仅是广东俗字，流传不广。取用“畚”字为族称，较能反映广大畚族地区经济生活特点的共同性。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畚民”是被称，而“畚民则自称为‘山哈’”。“哈”畚语意为客人，“山哈”即指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有的称“三客”，意为畚族兰、雷、钟三姓的客人。闽东的畚族至今还自称“山哈”，可能同宁德地区的畚族并非本地土著，而是明清时期从潮州和漳汀一带迁来有关系。

总之，畚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名称，但是自“畚民”一词出现之后，史书上便普遍用这一名称来记载这一民族的史事。以“畚”字作为民族名称，无论从其来源和字义都体现了畚族人民勤劳勇敢的劳动本色。因此，解放后国家便以此为据，于1956年正式把“畚族”确定为这个民族的名称。

二、关于畚族族源的问题

关于畚族的来源，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三种：1、认为畚族是第一批殖民闽粤的汉族⑦；2、畚族是古代先住民族越族的后代⑧。持这种看法者，有的认为它是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子孙⑨；有的则以为它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代⑩；3、认为畚族源自汉晋时代居住在长沙一带的武陵蛮（或称五溪蛮）。持这种说法者，有的认为畚族和瑶族同源，都是武陵蛮的后代；有的主张畚族是瑶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⑪。

我们认为，畚族的先民在汉族移闽之时，已居住在福建。因此，把它说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这明显与史实不符。至于主张畚族是武陵蛮南迁的遗族或畚民是瑶族的一支，目前不论从畚族现在继续流存的传说还是从有关史书的记载中，都找不到充分的根据。

畚族是瑶族一支的主张者认为：“畚族是出自唐宋时代住在五岭东端的瑶人，而远源于汉晋的‘五溪蛮’”，“瑶人的一支约在唐初进入今粤、赣、闽三省交界的地区”。“唐宋时，蛮、瑶混称，所谓‘蛮’或‘洞蛮’，实即瑶人，也就是畚民的祖先”。但是我们从畚族早期活动的历史加以考察，情况并非如此。

据史书记载，唐初，唐高宗为了“靖边方”，命陈政、陈元光父子于总章二年（669年）“挂新铸印符，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士，自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⑫。当陈政带领的这一大批由汉人组成的唐军入闽，进驻泉潮一带后，就遭到聚居在“出没无常”的畚族先民“蛮僚”的激烈的反抗。《云霄厅志》记载：“（唐）

高宗总章二年，泉、潮间蛮僚啸乱。”“总章二年，（陈元光）随父（陈政）领兵入闽，父卒，代领其众，会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进攻潮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已而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猝抵岳山。元光闻报，遽率轻骑御之，援兵后至，为贼将兰奉高刃伤而卒，时景云二年十一月也”^⑩。打败了唐王朝多次的武装镇压，连守帅陈元光也被“刃伤而卒”，很难想象，仅在“唐初进入今粤、赣、闽三省交界的地区”的所谓“畬民祖先徭人”，能在短时间内，而不是经过长期的安定生息繁荣和发展，能组织如此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能有这么强大的反抗力量？从这一史实分析，足以说明在唐代以前畬族祖先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这一地区，他们并不是唐初才从其他地区迁入的。

在唐代以前，闽粤赣交界这地区史书上见不到有其他民族迁入的记载，汉人进入汀江地区，最早就是唐初陈政所率领的这批军队。唐王朝用武力统治了这一地区之后，于公元686年（垂拱二年）和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先后设置漳州和汀州郡治^⑪，开始建立封建统治。汀江设治后，汉人陆续移入这一地区，因此使得这地区从原来是一个畬族先民“散处之乡”变为“民僚杂处”之地，畬汉两族人民开始杂居。所以清杨澜《临汀汇考》一书指出：“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⑫。把畬族看成是汀州的土著民族，这个意见是可信的。

那么，汀州这个被杨澜称作“本土之苗”的土著居民，在古代又是属于何种民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务须对唐以前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历史情况，加以考察：解放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大量印纹陶文化的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印纹陶文化是古代百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文化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于商周时代，衰落于秦汉之际。它的遗址的大量发现，说明了这一地区在秦汉以前就有越人住在这里生息着。到了秦汉时代，闽粤赣交界地区是当时福建的“闽越”和广东的“南越”的交界地。据史载，秦末时，东瓯（百越中的一支）、闽越首领曾出兵“佐诸侯灭秦”；楚汉之争，他们又支持刘邦打败项羽，所以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便封摇为东瓯王，无诸为闽越王。汉高祖十二年越族后裔南武侯织，又被汉王朝“立以南海王”^⑬。潘蔚在《汉南海王织考》一文指出，当时“南海王”的封地“在今江西之东南以迄福建的西南，界于闽越与南越之间”^⑭。如果这一考证不误，畬民的祖先同“南海王织”这支越人，关系至为密切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统一东越，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⑮。越族的名称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了。一直到了汉晋时期，在我国东南地区一些山地又出现一种名叫“山越”的土著居民。历史学家认为，山越是秦汉时代百越人的后裔。

以上史实说明，宋代的“畬民”，其早期的历史和族源可溯至隋唐的“蛮僚”，汉晋时代的“山越”，秦汉时代的越族。因此，我们赞同畬族是古代越族后裔的意见。

此外，主张畬族源于武陵蛮或说畬族为瑶族一支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根据两族都流传着“槃瓠传说”。这个传说的详细内容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南蛮传》认为槃瓠传说流传于“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因此后来一些研究者大都据此记载，把笃信槃瓠的民族都认为是来源于武陵蛮，都是从湖南长沙这个地区迁去的。

畬民是笃信槃瓠传说。但是从文献和畬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从未见到畬族有从长沙

武陵蛮迁来的记载或传说。畲族人民世代相传叙述祖先历史的长篇叙事诗《高皇歌》（又称《槃瓠王歌》），指出广东潮州凤凰山是他们祖先最早活动的地区。笔者1981年访问潮州，据畲族干部说，在凤凰山上还有他们祖先的祖坟，福建、浙江的畲族也都认为他们是从潮州凤凰山迁来的，而且在族谱也是这样的记载。据了解，现在潮州人唱山歌还称为“斗肇歌”。肖遥天《潮音戏的起源和沿革》一文，在论潮音戏和畲歌的关系时谈到：“潮州的土著，陆为畲民，水为蛋民。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调，而蛋歌却是最原始与它有影响的东西。畲歌和蛋歌是最纯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曾为潮歌的主流。今日的潮州民谣，犹有概称作畲歌的。”山歌民谣是畲族文化最有特色的东西，畲族为潮州最古老的居民，其山歌还留给当地很大的影响。因此视潮州为畲族最早的居住地是有根据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范晔所写《后汉书·南蛮传》是集诸家之言而成一家之作而已。范是南朝人，在他之前如晋人干宝《晋纪》、《搜神记》、郭璞《玄中记》以及更早的《风俗通义》、《山海经》等书，对槃瓠传说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搜神记》明确记载流传槃瓠传说地区是“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几乎遍及江南大部分地区。《后汉书·南蛮传》所记槃瓠传说，基本上是抄录《搜神记》的。因此，怎能把崇拜槃瓠的民族都说是来源于武陵蛮。上述这些书也都没有说只有长沙武陵蛮才流传此传说，有的书则根本没有提及武陵蛮。事实上，槃瓠是古代南方一些民族比较普遍的信仰。据凌纯声先生研究，信仰槃瓠，除畲族外，还有瑶族、苗族、黎族和高山族的泰耶人等；在世界民族中，也有十多个地区是拜犬为图腾的^⑩。因此，沿用范晔的说法，把信仰槃瓠的古代民族都认为来源于武陵蛮的观点，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畲族来源于古代越人的说法，可证的资料比较多。但是由于畲族没有文字，汉文史书记载又比较缺乏，考古资料作证还不多，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关于福建畲族历史上的迁徙活动

福建畲族的先民最早聚居在漳汀地区，直至宋元时期基本上还是如此。宋末元初畲民领袖陈吊眼等领导畲族人民大规模的反元斗争，配合宋将张世杰围攻泉州，就是来自漳汀地区^⑪。元代畲族活动的主要地方，即今长汀、龙岩、长杭、武平、漳平、宁化、漳州、长泰、华安、龙溪、南靖、漳浦、诏安、平和、云霄以及安溪、邵武和政和等地。

从明代开始，在闽中、闽东地区才开始有畲族活动的记载。明周华《游洋县志》（民国版）记载万历年间莆田曾爆发了畲汉人民大起义^⑫。同书还记载了明嘉靖年间福安县畲族曾参加平倭斗争^⑬。明谢肇淛《太姥山志》记载他在万历年间游太姥山过湖畔时，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⑭。他在《五杂俎》书中，又说这时畲民在“福州、闽清、永福（即今永泰县）山中最多”^⑮。《罗源县志》亦云：“（万历）三十九年，群虎伤人，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督畲民用毒箭射杀四虎，患方息”^⑯。畲族人口最集中的福安县，在清代已有二百多个自然村有畲族居住，几乎遍及该县的各个角落^⑰。现在有畲族居住的县市，在清代或民国版的地方志书上普遍都有他们历史的记载。这说明至清代畲族分散的杂居情况已经形成，畲族历史上频繁

的迁徙活动也告结束。

关于畬族的迁徙路线,据《高皇歌》记述,畬族的祖先最早“住在潮州”,后来他们再从潮州向福建迁徙,“兴化古田住久长,三姓(指畬族兰、雷、钟三个姓氏——笔者注)开基在西乡;西乡难住三姓子,又搬罗源过连江。”“西乡”即汀潮地区。潮州的畬族又相传有的是从汀州迁去的。所以汀潮地区应视为畬族历史上最早的聚居区。根据有关材料的记载和畬族的族谱可以得知,畬族离开潮汀地区向闽东方向迁徙的路线大体是:闽南——闽中——闽东的连江——罗源、寿宁,然后转向福安、霞浦、福鼎,其间各地又往返迁徙,这是一条主要路线。至于建阳地区和三明地区的畬族大部分也是从汀漳一带迁去的,有一部分则是从福州往北迁去的。浙江的畬族是从闽东迁去的。

经过明清时期畬族频繁的迁徙活动,使闽东、浙南逐渐成为现在畬族的主要居住地区。而早期聚居的龙溪和龙岩地区的畬族,现在人口很少,除外迁的一部分外,留下未走的人由于长期同汉人接触,大部分便逐渐汉化了。比如有史可考的畬民的姓氏,除了现在兰、雷、钟三姓外,还有陈、李、黄、谢、刘、邱、罗、晏、张、余、袁、聂、辜、章、何、梅、苗、朱、筇、鼓、患等二十多个姓^②。这些姓氏在现在畬族中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上畬民被汉化的明证。

畬族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很早以前已过着定居生活。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发生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活动,其原因正如《高皇歌》所说的那样:“人多田少难做吃”,“三姓搬出凤凰山”,“开着地差没作食,开着田好官来争”。“奈因官差难作食,思量再搬住浙江”。也就是说,由于汉族官吏的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再加上人口的增多,导致历史上畬族人民的不断迁徙。

畬族迁徙时,多是亲近的(如兄、弟;亲族等)的几家几户相约而行的。他们一到新址,便相邻而居,繁衍下来,因而现在畬族村寨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如福鼎县牛垵下片,绝大多数姓雷,陶必山村姓钟;浮柳片兰厝村姓兰,深垵村姓李,往里村姓钟。也有一些村庄是两个姓聚居在一起的,如福安县的山头庄、小岭就是钟、雷两姓聚居在一起。

明清时代,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土地高度集中,一小撮地主官僚霸占了大量土地。所以,畬族一到新址,便向地主租种土地,沦为佃户。如建阳畬民“所耕田皆汉人业”^③。兴化畬民向汉族地主“租山耕植”,“垦山为业”^④,经济上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在政治上,封建政府对迁往各地居住的畬民普遍推行“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的政策^⑤。于是畬族人民便同当地汉族人民一样遭受反动的保甲制度的统治。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就必然造成畬族人民大都居住在山区和半山腰地带,几户、几十户成村,周围都是汉族居住的村落,或与汉族杂居的大散小聚的居住特点,不可能形成有一个民族聚居区。因而在明清以来,畬族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同汉族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决定了畬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同当地汉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所以,解放后党在畬族地区采取的与汉族地区一起发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广大畬族人民的愿望。

注:

①《刘宾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

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

②《云霄厅志》卷十一,唐宦绩,陈元光条。

③《资治通鉴》卷259,唐纪75。

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

⑤《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⑥《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广东上。

⑦董作宾：《说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第十四期。

⑧傅衣凌：《福建畬姓考》《福建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⑨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民考》《福建文化》第二卷，第二期。

⑩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

⑪徐规执笔：《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杭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1期

⑫《云霄厅志》卷十七，艺文《诏陈政镇故绥安县地》。

⑬《云霄厅志》卷十一，唐宦绩，陈政、陈元光条。

⑭《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漳州、汀州。

⑮《临汀汇考》卷三，畬民。

⑯《汉书·高帝纪》。

⑰《文史汇刊》第一卷，第二期。

⑱《史记·东越列传》。

⑲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

⑳《宋季三朝政要·附录》《宋史、张世杰传》。

㉑《游洋县志》卷八《大洋巡检司碑记》。郑嵎：《纪变蛮言》。

㉒《游洋县志》卷九，杂记。

㉓《太姥山志》卷中、卷下。

㉔《五杂俎》卷六。

㉕《罗源县志》卷二十九，祥异。

㉖《福安县志》卷三、疆域。

㉗傅衣凌：《福建畬姓考》。

㉘《建阳县志》卷二，畬民风俗。

㉙《兴化县志》卷八。

㉚《福建通志·风俗志》卷二。

（上接第74页）

福州还有一些铜、铁、铅矿，由所谓‘有力之家’的坑户向官府承租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76页）。

〔59〕淳熙年间舒州汪革“招合流徙”冶铁，后来这些“逋逃群盗”还随他起兵抗官军（见岳珂：《桯史》卷6，“汪革谣诮”条），说明其间实有依附关系。福建的“有力之家”与收罗来的无业游民、破产农民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与此同。

〔60〕广东韶州岑水场的坑户（相当于福建的“有力之家”）以卖铜所得钱付“雇工价”（见《宋会要》食货三四之二二），虽无福建矿冶业在经营中雇工付值的明确记载，但以福建矿冶业的发展水平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均不亚于广东，且矿冶业中已出现货币税而论，雇工付值之现象当亦存在。

〔61〕见《云麓漫钞》卷2所载，南宋时建宁府瑞应银场之冶炼过程；又见《宋会要》食货三四之二三——二四所载嘉定十四年七月十一日臣僚言福建某铜矿之生产情形。

〔62〕《宋会要》食货三四之二四。

〔63〕“冶户无力兴工，许借常平司钱，俟中卖，于全价内克留二分填纳”（《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四四）。

〔64〕见《三山志》卷14，版籍类五。

〔65〕“诸处桡踏官吏大为民殃，有力之家悉从辞避……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未享其利而讎徒诬劾，桡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宋会要》食货三四之二三）。

〔66〕“桡踏官吏既加虐遇，而坑户复非土著，又不及时支給本钱……一听官吏掊克，所得一半本钱，钁销解放之外，尚馀余利贖食”（《宋会要》食货三四之二四）。

〔67〕见《通考》卷4，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

〔68〕唐代福建兴建水利工程仅29项，而宋代竟达402项，远远超过其他各路（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18页，“唐至宋水利事业发展表”）。

〔69〕见《新唐书》卷54，食货四。

〔70〕《宋史》卷180，食货下二，钱币。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

〔72〕见王应麟：《玉海》卷180，钱币。

〔73〕见《通考》卷9，钱币考二，历代钱币之制。

〔74〕同注〔73〕；又见《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一——三。

〔75〕同注〔73〕。

〔76〕见徐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又见《宋会要》食货五〇之一三及二二。

〔7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

〔7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纪事。

〔79〕《三山志》卷41，土俗类三，物产。

〔80〕真秀德：《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81〕同注〔80〕书，“申枢密院乞修浚海军政”。

〔82〕同注〔78〕书，卷150，绍兴十三年纪事。